

專輯論文

# 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 基於環保與徵地事件的綜合比較分析

周裕瓊、楊雲康

## 摘要

媒介策略是決定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通過對2009-2014年間發生的40起群體性事件的綜合分析以及對其中兩個代表性案例——番禺事件與烏坎事件——的個案比較，本文試圖考察在中國特定的媒介和政治生態下，環保和徵地抗爭的行動者是如何根據不同階段的行動目標——早期的共識動員、中期的行動動員、晚期的社會動員——在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策略中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根據研究發現，本文重點討論了新媒體在行動者與主流媒體博弈中發揮的作用，指出未來的抗爭必須更加重視新舊媒體之間的合縱連橫。

關鍵詞：社會抗爭、媒介策略、環保、徵地、新媒體

周裕瓊，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興趣：新媒體、輿論學。電郵：yuqiongzhou@126.com

楊雲康，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傳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媒體。電郵：yangyunkang@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6年3月2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6年10月19日。

---

Special Issue Article

## **Media Strategy of Social Contention in China: Comparing Environmental and Land Requisition Protests**

Yuqiong ZHOU, Yunkang YANG

---

### **Abstract**

Media strategy is a key factor in shaping the outcomes of social contention. Based on a meta-analysis of 40 mass incidents from 2009 to 2014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well-recognized cases (i.e., the Panyu and Wukan incidents), we situated our study in China's particular media and political ecology. We analyzed the micro-processes in which the environmental and land requisition protesters in these incidents used three distinct media strategies (i.e., mediated contention, connective leadership, and media co-empowerment and circulation)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i.e., consensus mobi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action mobilization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late stage). We also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new media in the game playing between activists and mainstream media. We suggest that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edia will play a greater role in future social contention.

---

Yuqiong ZHOU (Professor).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for Media and Social Changes, Shenzhen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Yunkang YA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Media Strategy of Social Contention in China*

**Keywords:** social contention, media strategy, environmental protest, land requisition, new media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u, Y., & Yang, Y. (2017). Media strategy of social contention in China: Comparing environmental and land requisition protest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0*, 169–20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引言

抗爭性政治 (contentious politics) 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于建嶸, 2010)。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 參與人數過百的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8,700個, 飆升到2004年的74,000個 (中國社科院, 2005)。而這個數字在2006年升至9萬, 此後每年都超過10萬。其中, 環境保護和徵地拆遷分別是導致中國城鎮和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主因 (中國社科院, 2013), 因此環保和徵地抗爭也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隨著研究個案的不斷累積, 學術界得以探究決定中國社會抗爭成敗的普遍性因素。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科的現有研究凸顯了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這兩大要素的作用。關於行動策略, 研究者提出了「依法抗爭」(O'Brien & Li, 2006)、「以法抗爭」(于建嶸, 2004)、「依勢抗爭」(董海軍, 2008)、「以死抗爭」(徐昕, 2008)、「以身抗爭」(王洪偉, 2010)、「表演式抗爭」(黃振輝, 2011)等一系列概念。針對話語策略, 西方學者關於集體行動框架的研究成果 (Benford & Snow, 2000) 被廣泛用於分析中國的抗爭性話語 (黎相宜, 2009; 夏瑛, 2014), 研究者還專門討論了中國獨特文化資源對話語的改造 (鄭雯、黃榮貴、桂勇, 2015)。

與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組織專業化、動員職業化、訴求政治化」的運動風潮不同, 中國的社會抗爭具有鮮明的「無組織、非專業、去政治」特徵 (劉能, 2009; 羅興佐, 2013)。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動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 而媒介化程度——具體表現為行動者的媒介使用度、媒體關注度與報道度、網絡熱搜度與討論度等——已然成為判斷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因此, 媒介策略理應成為群體性事件「成功套餐」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身處媒介化社會, 抗爭者的言 (話語策略) 行 (行動策略) 與媒介之間的勾連日益密切, 這就更加凸顯媒介策略的研究價值。對其展開考察, 不僅要關注媒介「場域」(media field) 內新聞工作者是如何報道社會抗爭的, 更要關注媒介「場域」外人們是如何利用媒介資源以輔助實施社會抗爭的話語策略和行動策略 (Chadwick, 2013)。

相比於其他學科對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的研究, 傳播學界對媒介

策略的研究，起步更晚、成果有限，在概念層面也少有建樹，遑論機制總結。因此，我們決定選取訴求迥異、參與者不同、發展軌跡不盡相同的環保和徵地群體性事件來進行綜合比較，考察其媒介策略的相同或相異之處，分析媒介策略是如何在抗爭的不同階段輔助行動者實現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等不同目標，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新舊媒體聯手推動抗爭性政治成功的內在機制。我們希望，本研究不僅能勾勒出2009–2014年間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化圖景，為相關研究者提供歷史性資料，還可以將近年來學術界關於媒介策略的零散討論整合成一個相對成熟的概念化框架，為後繼研究者提供理論工具。

## 文獻綜述

### 媒介策略

所謂媒介策略，即行動者在特定的媒介生態中為實現抗爭目標對媒介資源進行動員和整合的過程。媒介策略與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Freeman, 1979; McCarthy & Zald, 1977; Tilly, 1978) 一脈相承，它強調抗爭是理性的、是為了實現抗爭目標而不斷調整的策略性行為。該理論認為，抗爭資源應包括土地、資本、人力、傳播工具和技能 (Jenkins, 1983)。我們認為，作為抗爭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資源不僅包含傳播工具 (例如社交媒體、報刊、電視、廣播等)，還包括行動者的媒介技能 / 素養以及所能調動的媒體人脈資源。尤為關鍵的是，媒介資源的動員和整合必須在特定的媒介生態中展開——如果不在宏觀層面上考察中國抗爭者所處的媒介生態 (例如媒體審查制度、媒體雙軌制、新聞雙重性、「牆」內外輿論空間的互嵌等)，我們就很難理解行動者媒介策略的動機和效果。

鄭雯和黃榮貴 (2016: 47) 提出了「媒介邏輯」來概括「整個媒介生態對抗爭的影響」，並將之分為內容邏輯、技術邏輯和制度邏輯三大部分。我們的研究則關注行動者在特定媒介生態中，是如何動員整合各種媒介工具、媒介技能 / 素養和媒體人脈資源來展開傳播實踐，實現不同階段的抗爭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將從大眾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爭」、社交媒體主導的「連接性領導力」以及新舊媒體共同主導的「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個分析框架對中國抗爭者的媒介策略進行梳理和總結。

## 媒介化抗爭

在社會運動常態化的西方，主流媒體對社會抗爭的報道也基本常規化：在宏觀因素(包括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等)、中觀因素(包括組織特徵、管理制度等)和微觀因素(包括記者的個人特徵、新聞價值觀等)的綜合影響下，主流媒體試圖從更廣義的社會情境出發解讀集體行動、實現社會整合(綜述參見Scheufele, 1999)。吉特林(Gitlin, 1980)的經典研究顯示，主流媒體的選擇性報道造就並最終破壞了美國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在媒介霸權和新聞專業主義的作用下，西方社會抗爭的行動者與媒介進行博弈的空間不斷縮小。

由於中國社會抗爭大多是「非專業化」的，行動者與媒介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更加顯著。行動者不但需要吸引媒介報道來擴大影響，更需要「媒介抗爭專家」來幫助他們實現共識動員(孫瑋, 2007)、行動動員(呂德文, 2012)和社會動員(陳天祥、金娟、胡三明, 2013)。媒介邏輯成為抗爭的指導性邏輯，越來越多的抗爭從「上訴」、「上訪」轉向「上報」、「上網」，媒介化抗爭應運而生(鄭雯, 2015)。以2010年9月發生的宜黃拆遷事件為例，呂德文和鄭雯分別展開的兩項研究都考察了媒介是如何將鍾家人的個體抗爭升級為「要求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發動制度變革的專業化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呂德文, 2012: 129)，演繹出「抗爭政治」(鄭雯, 2015)。他們借用了西方學者的概念化工具，比如「公開、參與、共意凝聚」(Michailidou, 2010)來分析媒介化抗爭的過程，以及「界限激活、居間聯絡、動員-遣散」(蒂利、塔羅, 2010)來分析媒介化抗爭的機制。兩位研究者都冷靜地認識到，大眾媒介作為中國的「新興權利階層」，不遺餘力地對釘子戶的底層抗爭給予「專業化」指導，本質上是脫離了國家體制、日趨市場化的媒介嘗試進行「反體制的體制重建」。可以想見，隨著政府對意識形態管制的收緊，大眾媒介扮演抗爭專家的機會必然越來越少，更多的時候只能回歸到耳目喉舌的傳統角色，媒介化抗爭或將式微(陳鵬、臧雷振, 2015)。

## 連結性領導力

相比於媒介化抗爭所天然具有的精英視角(即, 聚焦於大眾媒體對事件的呈現), 連結性領導力則從底層視角出發, 聚焦於行動者通過社交媒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ICT新媒體)所展開的自主傳播實踐。對於行動者來說, 新媒體不僅是信息分享和討論的平台, 更是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的工具, 關於這一點, 前人之述備矣(綜述可參見Garrett, 2006; Huang & Sun, 2014)。值得探討的是, 在中國「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MacKinnon, 2011)的大背景下, 同樣受到越來越嚴密管制的新媒體是如何被行動者用來爭取更大的活動空間?

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運動, 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越來越突破信息傳播媒介的局限, 而成為社會運動組織結構的一部分(Diani, 2015)。班尼特和塞格伯格(Bennett & Segerberg, 2012)使用連結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這一概念來替代傳統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概念, 強調自發性的分享行為本身在經過「整合」後具備了組織的特徵, 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社會運動組織。但是, 目前西方學者對於「誰來主導整合」有著不同的側重。班尼特和塞格伯格認為信息分享的過程就是信息整合的過程: 基於大規模數字媒體網絡的個性化分享可以自發地、有機地完成「生產」(production)、「打撈」(curation)以及「聚合」(integration)的功能(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 使社會運動在三個層面上具備組織的特性, 即, 「應對外部危機」、「資源動員」以及「長期地自我調整」。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Bennett & Segerberg, 2014)並不否認在某些行動網絡中一小部分行動者完成了內容「生產」和「聚合」的大部分工作, 例如美國反網絡知識產權保護法運動(Stop Online Piracy Act and Protect IP Act)中大部分網絡內容呈現出長尾形狀。而不少歐洲學者(如Della & Valeriani, 2014; Gerbaudo, 2012, 2016; Poell, et. al., 2016)則認為「整合」並不是自發地由分享行為本身完成, 而是由新媒體骨幹分子策略性地主導完成的。他們反對使用「無領導」(leaderless)、「自發性」(spontaneity)以及「扁平化」(horizontalization)的說法, 並提出「連接性領導人」(connective leaders)和「數碼先鋒隊」(digital vanguards)等概念來指代新媒體抗爭領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我們認為，雖然中國不少網絡原發的群體性事件(如郭美美事件)呈現出由信息分享實現信息整合的特點——天南海北的「鍵盤俠」一擁而上，熱鬧過後又悄然退場——但伴隨線下抗爭的線上行動大多離不開「連接性領導人」對新媒體資源的整合。他們往往依靠業主QQ群、社區論壇、微博和微信等「融合性社區媒介」來完成組織動員(王斌、古俊生, 2014)。我們認為這種整合就是社交媒體主導的媒介策略, 即「連接性領導力」(connective leadership)。其「連接性」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 實現跨平台、跨網絡的信息聚合, 這包含連接不同的新媒體平台、連接數字網絡中分散各處的行動團體、連接線上和線下行動者, 以及連接以宗族、家族為基礎的傳統人際網絡與虛擬人際網絡(Della & Valeriani, 2014); 二, 將當地行動網絡與跨國行動網絡實現有效的對接: 由於威權國家的抗爭者經常面臨信息封鎖和監控, 他們尤其需要動員國際力量繞過封鎖, 這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現的尤為明顯(Howard & Hussain, 2013)。而「連接性領導力」的「領導力」則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 核心分子利用抗爭官方賬號選擇性地發布線下抗爭的相關信息(Gerbaudo, 2016); 二, 將抗爭品牌化(branding), 一方面將抗爭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 鼓勵每一個行動者建立個人與抗爭的私人化的關聯(Poell et. al., 2016), 另一方面在眾包(crowd sourcing)的基礎之上決定最終的行動策略, 構建既開放又一致的行動框架(Yang, 2016)。我們將在個案深描中詳細分析新媒體主導的媒介策略「連接性領導力」是如何在中國的語境下發揮作用的。

### 媒介互激與循環

媒介策略不僅局限於行動者對新媒體的自發使用, 還包括行動者策略性地使用新媒體來激發傳統媒體的回應與共鳴。在新媒體上發布信息, 引發熱烈圍觀、形成熱點話題, 進而吸引傳統媒體的關注, 這種先「上網」再「上報」的做法, 是中國社會抗爭中常見的媒介路線。在抗爭的關鍵時期, 新舊媒體之間往往互相援引、形成「媒介循環」, 通過疊加效應設置公眾和政府議程(曾繁旭、戴佳、王宇琦, 2014)。然而, 當某個新媒體事件被納入主流媒體報道之後, 缺乏新意的同類事



件獲得再次關注的幾率就將減少，這種「範式訂定」效應（李立峯，2009）使得行動者必須不斷創新表演劇目，「表演式抗爭」應運而生（黃振輝，2011）。草根行動者往往會採取極端化行為（比如賣身、跳樓、自焚等），但隨著表演越來越極端，社會大眾就越來越麻木，邊際效益遞減，媒介策略最終失敗。而具有較高媒介素養的城市中產階級卻能通過有創意的「行為藝術」引發網絡關注，與主流媒體形成互激效應（黃煜、曾繁旭，2011）。不過這種媒介策略的成功與否，除了與行動者本身的能力有關，還受到媒介體系和媒體公民社會的影響。同樣是垃圾焚燒抗爭，番禺事件因為廣州媒介市場化程度高、媒體公民社會成熟而形成了有效的新舊媒體互激，而三里屯事件則因北京在上述方面相對較弱，未能形成互激效應。

## 研究問題與假設

社會變遷是影響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一大宏觀因素（趙鼎新，2006）。正如前文所述，只有將抗爭者的媒介策略放入變遷中的媒介生態中考察，我們才能準確把握這種變遷將如何影響到群體性事件的媒介呈現，並進一步地影響到行動者的媒介策略。近年來中國媒介生態變遷的最顯著特徵就是執政黨對所有媒體的輿論管控不斷加強（王夢瑤、胡泳，2016）。習近平在2016年2月19日主持召開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不僅「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都市類報刊、新媒體也要講導向」，「娛樂類、社會類新聞也要講導向」。黨報黨刊與市場化媒體之間、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報道差異被逐漸抹平，這就更加凸顯了「牆」內外媒體（即，大陸媒體與海外中文媒體）在輿論自由度上的顯著差異。國際媒體是媒介生態中的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阿拉伯之春中的抗議者用Twitter發布抗爭訊息，吸引國際媒體Al-Jazeera的參與，從而繞過國內的信息封鎖，構建了「泛阿拉伯」抗爭空間（Tufekci & Wilson, 2012; Poell, 2014）。在中國，「牆」內外媒體差異是否能給行動者帶來媒介資源，構建「泛中華」抗爭空間？首先，我們需要通過以下幾個假設來檢驗「牆」內外媒體差異在報道環保與徵地群體性事件上的具體表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H<sub>1</sub>：「牆」內外媒體的報道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更傾向於轉載(官方通告、新聞通稿等)而非原創，海外媒體則反之。

H<sub>2</sub>：「牆」內外媒體的報道對象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更願意報道不挑戰「政權合法性」、相對安全的環保抗爭而非徵地抗爭，海外媒體則反之。

H<sub>3</sub>：「牆」內外媒體的報道框架存在顯著差異：大陸媒體會更多地使用強調和諧的「對話」框架、更少地使用強調衝突的「對抗」框架，海外媒體則反之。

基於上述研究假設，我們試圖回答一個研究問題：大陸媒體和海外媒體的差異化報道將對行動者的媒介策略產生何種宏觀層面的影響？

如果把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策略與社會抗爭在不同階段的不同目標(即，早期的共識動員、中期的行動動員和晚期的社會動員)相比照，不難發現，兩者在時序上存在合乎邏輯的內在對應關係。在中國，早期的共識動員必須是「非組織化」的「地下行動」，如果提前曝光，則有關部門的介入將使抗爭戛然而止。因此，行動者通過網絡論壇、QQ群、微信群等低成本的社交媒體平台發揮其「連接性領導力」，聚合分散的力量、形成集體的共識、構建虛擬的組織。在中期，為了實現集體行動(如靜坐示威、集體上訪、遊行散步等)的動員與造勢，行動者必須同時使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通過兩者的互激與循環來鼓舞士氣、吸引關注、擴大影響。在晚期，為了使特定群體特定訴求的抗爭升華為全社會共同的社會運動，則應充分發揮媒介抗爭專家的作用，通過媒介化抗爭將事件報道升級為凱爾納(Kellner, 2003)所定義的「媒介奇觀」(media spectacle)。為了證明上述推測，我們將選取發生在同一省份、且都取得標誌性成功的兩個案例——2009年番禺垃圾焚燒事件和2011年烏坎徵地事件——來進行個案比較，分析在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行動者是如何在三大策略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

## 數據採集

政治學和社會學對中國社會抗爭的研究早已突破了個案分析的局限，通過縱橫比較大量案例，來回答問題、發展理論。比如蔡永順 (Cai, 2010) 搜集了1994–2007年間在27個省發生的266起群體性事件，從政治機會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指出行動者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是抗爭成功的關鍵。奧布萊恩和李連江 (O'Brien & Li, 2006) 對1994–2004年間中國農村的集體行動進行考察，認為中國的行動者擅長利用當權者的話語體系在國家權力與地方權力之間尋找空隙和分歧，來伸張自己的權益。相比之下，傳播學界對社會抗爭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個案深描階段，但近年來也有零星的綜合研究，如鄭雯等人 (2015; 2016) 對拆遷抗爭中媒介邏輯的多案例分析、楊雲康 (Yang, 2016) 對新媒體與議題機會結構的多案例分析。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嘗試，我們希望將多案例綜合分析與個案深描比較結合起來，對群體性事件的媒介策略展開深入考察。

為了進行多案例綜合分析，我們使用LexisNexis Academic和慧科新聞這兩大數據庫，以environmental、land、protest、China，或環保、徵地、衝突、群體為關鍵詞，搜索2009–2014年間發生在中國並被中外媒體報道的群體性事件，共搜集到22起環保事件和18起徵地事件，<sup>1</sup>以及相關的4,167篇中文報道。兩位研究生經過培訓後，對40篇新聞報道 (20篇內地、20篇海外，環保與徵地報道各半) 進行試分析，兩人之間的inter-coder reliability達到83%，針對雙方存在歧義的項目，經我們共同討論後修訂編碼指引。然後，兩位研究生對4,167條新聞報道進行正式編碼。具體項目包括：發布時間、篇幅、原創性 (原創報道 vs. 轉發官方通稿、轉載新聞通稿等)、報道主題 (徵地 vs. 環保)、以及報道框架 (對抗 vs. 對話 vs. 其他)。其中前四項無需贅言，關於最後一項——報道框架——我們規定如果報道聚焦於對抗性場景 (比如民眾遊行示威、官方維穩鎮壓等) 或話語 (比如民眾對相關企業、社會機構或政府部門的指控、官方對群體性事件的負面評價等) 就編碼為「對抗」，如果報道聚焦於相關各方之間的談判與互動 (比如聽證會、座談會、現場考察等) 就編碼為「對話」，如果無法判斷或與上述無關，則編碼為「其他」。上述內容分析的數據，將主要用於驗證H<sub>1</sub>、H<sub>2</sub>、H<sub>3</sub>，並回答相應的研究問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為進一步比較徵地與環保的代表性案例，我們選取同樣發生在廣東的2009番禺事件和2011烏坎事件進行個案深描。相關數據來自新媒體(論壇、QQ群、微博等)、傳統媒體(從慧科新聞檢索出海內外媒體的相關報道)、行動者訪談、參與式觀察以及田野調查。<sup>2</sup> 個案比較旨在考察行動者是如何在媒介化抗爭、連結性領導力、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策略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與切換。

### 徵地與環保抗爭的多案例綜合分析

2009–2014這六年間，大陸和海外媒體對徵地和環保群體性事件的新聞報道數量一直起伏不定(表一)。有些年份報道密集，有些年份卻很少甚至沒有報道。社科院每年發布的藍皮書顯示，這兩類群體性事件年年高發，在某些年份被媒體「集體遺忘」，理應不是巧合，必然和媒介管制有較大關聯。近年來，新聞管制的「紅線」越來越難以捉摸，往往因事而異、因時而異，而且宣傳部門的「旨意」多以口頭形式下達，很難有固定成文的規定。對於大陸媒體從業者來說，報道群體性事件就像一次次打「擦邊球」的冒險，有些球能安全過網，有些卻被中途攔截，這種「度」的把握充滿隨機性(張志安，2013)。對於海外媒體來說，進入中國採訪本身就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冒險，各級政府為了攔截海外記者用盡「十八般武藝」，報道最終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運氣。因此，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數量很難維持一個穩定的水平，上下起伏在所難免。

表一 2009–2014年期間群體性事件所吸引的媒介報道量

年份	大陸媒體				海外媒體			
	環保		徵地		環保		徵地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篇數	原創
2009	978	139	/	/	67	53	/	/
2010	/	/	191	30	/	/	31	15
2011	227	61	486	70	81	81	514	451
2012	176	35	/	/	85	68	/	/
2013	234	23	6	3	88	29	3	2
2014	398	53	410	27	157	32	35	19
總計	2,013	311	1,093	130	478	263	583	487

### 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方式(原創 vs. 轉載)之比較(H<sub>1</sub>)

對比表一中大陸媒體與海外媒體數據，我們看到，2009–2014這六年間發生的40起事件共吸引了大陸媒體總計3,106篇報道(平均78篇)、海外媒體總計1,061篇報道(平均27篇)。儘管從絕對數量上來，大陸媒體的報道量遠高於海外媒體，但前者有85.8%系重複轉載的官方通告或央媒通稿，將之剔除後，僅剩下441篇(平均11篇)；而海外媒體的重複轉載率僅有29.3%，將之剔除後，仍剩下750篇(平均19篇)。大陸媒體的轉載率遠多於海外媒體，海外媒體的原創率遠高於大陸媒體( $X^2(1, N = 4,167) = 1,193.11, p < .001$ )。H<sub>1</sub>得到了支持。

### 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對象(環保 vs. 徵地)之比較(H<sub>2</sub>)

對比大陸與海外媒體對不同訴求群體性事件的報道量，我們得到相映成趣的兩大發現：一，大陸媒體對環保事件的報道量高於徵地事件，平均而言，每起環保事件吸引的大陸媒體報道量為92篇(14篇原創報道)，而每起徵地事件吸引的大陸媒體報道量為61篇(7篇原創報道)。二，海外媒體對徵地事件的報道量高於環保事件，平均而言，每起徵地事件吸引的海外媒體報道是32篇(27篇原創)，而每起環保事件吸引的海外媒體報道為22篇(12篇原創)。遺憾的是，儘管「牆」內外媒體對兩類事件的原創報道量存在成倍差異，但在統計學上都不具有顯著性(大陸媒體： $t(38) = 1.45, p > .05$ ；海外媒體： $t(17) = 0.61, p > .05$ )，H<sub>2</sub>未能得到充分支持。

### 大陸與海外媒體報道框架(對話 vs. 對抗)之比較(H<sub>3</sub>)

如表二所示，大陸媒體的原創報道使用「對話」框架的幾率(56.9%)遠高於海外媒體(26.1%)，而使用「對抗」框架的幾率(12.5%)則遠低於海外媒體(54%)，兩者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 $X^2(2, N = 1,191) = 207.56, p < .001$ )。進一步的比較顯示，大陸與海外媒體之間的框架差異，無論在環保事件( $X^2(2, N = 574) = 225.17, p < .001$ )還是徵地事件( $X^2(2, N = 617) = 21.91, p < .001$ )中，表現都是一致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H<sub>3</sub>得到支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表二 大陸與海外媒體原創報道框架之比較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 (n = 441)	56.9%	12.5%	30.6%
海外媒體 (n = 750)	26.1%	54%	19.9%
環保事件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 (n = 311)	61.9%	7.4%	31.5%
海外媒體 (n = 263)	17.1%	66.5%	16.3%
徵地事件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 (n = 130)	46.9%	24.6%	28.5%
海外媒體 (n = 487)	31.0%	47.2%	21.8%

### 「牆」內外報道差異對行動者媒介策略的影響

綜合上述比較，我們發現，「牆」內外媒體在報道方式、報道對象和報道框架上存在顯著的差異：在報道方式上，海外媒體「做新聞」，發布大量自己採編的原創報道，而大陸媒體「做宣傳」，轉載大量的新聞通稿和官方通報；在報道對象上，大陸媒體對環保事件的原創報道量是徵地事件的兩倍，海外媒體對徵地事件的原創報道量則是環保事件的兩倍多；在報道框架上，大陸媒體更傾向於使用對話框架，而海外媒體更傾向於使用對抗框架。

學者們認為媒介對社會抗爭的報道是一種「反體制的體制重建」(呂德文, 2012; 鄭雯, 2015)。現階段，這種「體制重建」無論如何都必須在體制容忍的範圍內嘗試。為了避免觸碰「紅線」，大陸媒體記者必須小心翼翼地選擇報道方式、報道對象和報道框架。環保事件雖然是由於少數人利益受損而爆發，卻能喚醒全社會的環保意識，從而演變成順應時代潮流且符合「可持續發展」國策的環保運動(童志鋒, 2009)，這正符合「反體制的體制重建」的邏輯。李立峯(2009)在香港觀察到，「範式訂定」使得事件常規化，並因此導致後繼發生的同類事件無法再次吸引媒介關注。然而，在近年來大陸媒介管制不斷收緊的趨勢下，「內化」的自我審查逐漸凌駕於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理想之上，另一種「安全範式訂定」效應出現了：媒介傾向於更多地報道曾經出現過成功案例、其新聞生產範式能夠被安全複製的抗爭類型。過去十餘

年，環保事件報道已經訂定了多個安全範式，比如PX（廈門事件訂定了安全範式）和垃圾焚燒（番禺事件訂定了安全範式），只要後繼發生的同類事件可以納入到這個範式中來，媒介就會樂於跟進，並在報道中強調新事件與範式事件之間的聯繫。

徵地事件雖然和公民天賦的權利相關，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演變成「新農民運動」甚至新一輪的「打土豪、分田地」（Lagerkvist, 2015），給政權合法性帶來挑戰。因為找不到徵地事件報道的安全範式，大陸媒體從業者寧願放棄「臨場發揮」、「邊緣突破」等具有冒險精神的嘗試，更多地選擇不報道或轉發官方通告、轉載中央媒體通稿。由於西方社會的環保運動已經相當成熟而徵地抗爭卻非常鮮見，且中國的徵地抗爭往往會引發官民雙方的暴力衝突並上演極具特色的社會劇目，「隔岸觀火」的海外媒體對後者的報道熱情會顯著高於前者。當大陸媒體謹小慎微地退回到「宣傳式報道」的安全線內，海外媒體卻從最原始的新聞規律出發，或派出記者到現場採訪或依據網絡信息遠程編輯，突出抗爭中鮮活而富有衝突性、戲劇性或人情味的場景與話語，滿足海外受眾的需求。

隨著中國媒體管制的全面收緊，這種「牆」內外報道差異為行動者提供了僅有的媒介博弈空間，並勢必在宏觀層面影響行動者的媒介策略抉擇，形成媒介路徑依賴。相對於環保抗爭，徵地抗爭的行動者應更重視挖掘海外媒體資源，走「曲線救國」、「新聞出口轉內銷」的媒介化抗爭道路，但這種挖掘必須要把握好度，要避免海外媒體將抗爭過度解讀為「反體制」的暴動甚至革命。相對於徵地抗爭，環保抗爭的行動者應更多地利用大陸媒體資源，如果能將自己的抗爭包裹在已有的安全範式內，則成功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 環保與徵地抗爭的個案比較

在我們搜集的40起徵地與環保事件中，2009年番禺事件（環保）與2011年烏坎事件（徵地）分別被評為當年最具有影響力的群體性事件，<sup>3</sup>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如果能透過兩起事件的不同點找到其共通點，就能揭示出媒介策略在社會抗爭不同階段發揮作用的內在機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事件背景比較

表三總結了兩起事件在背景上的相同和相異之處。相同之處主要有兩點：一，發生地相同：都是發生在廣東。在全中國範圍來看，這裏的媒介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媒體構成相對更多元、媒介管制相對較弱、從業者的專業主義精神相對較強。雖然一個在城市、一個在農村，但中國的新聞報道與輿論監督在本省範圍基本相同。烏坎這個小漁村雖然遠離省府廣州，但2011年9月21日遊行之後，除了汕尾本地媒體，省級媒體（《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農村報》等）都有記者前來採訪（不過報道未能刊發，統一變成官方通告），可見廣東省媒體的覆蓋輻射能力在城市和農村是相當的。二，發生軌跡類似：都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前期，番禺（2009.9.23–10.23）vs. 烏坎（2009.6.21–2011.9.20），主要以內部動員達成共識為主；（2）中期，番禺（2009.10.24–11.23）vs. 烏坎（2011.9.21–12.10），主要是通過集體行動（集會、遊行、上訪、散步、簽名等）來表達訴求，實現行動動員；（3）後期，番禺（2009.11.24–12.31）vs. 烏坎（2011.12.11–12.31），關鍵性事件——番禺是2009年11月23日「散步」引起巨大關注並喊出「我們不要被代表」這一標誌性口號，烏坎是2011年12月11日薛錦波猝死——的發生，導致抗爭目標轉變，旨在通過更廣泛的社會動員為官民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番禺與烏坎事件的相異之處也有兩點：一，訴求迥異、結果不同：番禺事件的直接訴求是從鄰避主義（Not in My Backyard）出發的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連帶訴求是從環保主義出發的提倡垃圾分類回收利用。烏坎事件的直接訴求是從反腐維權出發的徹查徵地腐敗、追回被賤賣的土地，連帶訴求是從政治改革出發的改選村委會、實現基層民主。有趣的是，番禺事件的直接訴求實現了（垃圾焚燒廠改址），連帶訴求任重道遠（垃圾分類仍未全面實施）；而烏坎事件的連帶訴求實現了（重新投票選舉的村委會），而直接訴求任重道遠（被賤賣的土地難以追回）。二，參與者迥異：番禺事件的參與者為受過高等教育、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同質化（幾乎都是中青年白領）、社會資本充足（尤其是在主流媒體中擁有很豐富的人脈）、熟諳新媒體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



在之前多次社區維權行動中積累了較豐富的鬥爭經驗。烏坎事件的參與者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異質化(涵蓋老中青等各種年齡層，既有青年返鄉農民工如莊烈宏和張建興、中年返鄉創業者如楊色茂和薛錦波，也有德高望重的退休黨員如林祖鑾)、社會資本有限(幾乎不具有主流媒體人脈)、初學新媒體的失地農民，他們生活在海陸豐地區，深受潮汕文化和革命鬥爭傳統的影響。

表三 番禺與烏坎事件背景比較

	番禺事件	烏坎事件
相同之處	<b>發生地都在廣東</b>	
	媒介公民社會相對成熟、媒介生態富有多樣性 媒介管制相對較弱、從業者專業主義精神較強	
	<b>發生軌跡類似</b>	
	前期：番禺(2009.9.23-10.23) vs. 烏坎(2009.6.21-2011.9.20) 共識動員 中期：番禺(2009.10.24-11.23) vs. 烏坎(2011.9.21-12.10) 行動動員 後期：番禺(2009.11.24-12.31) vs. 烏坎(2011.12.11-12.31) 社會動員	
相異之處	<b>訴求迥異、結果不同</b>	
	直接訴求：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 結果：實現	直接訴求：追回被賤賣的土地 結果：未實現
	連帶訴求：垃圾分類回收利用 結果：未實現	連帶訴求：改選村委會 結果：實現
	<b>參與者迥異</b>	
	城市中產階級 受過高等教育	失地農民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同質化 社會資本充足	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異質化 社會資本有限
	熟諳新媒體 維權經驗豐富	初學新媒體 受潮汕文化和革命鬥爭傳統的影響

### 番禺與烏坎事件媒介報道之比較

我們對40起案例的綜合分析顯示，環保抗爭和徵地抗爭，因其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程度不同，所引發的海內外媒介關注(媒體來源、媒體報道量和報道框架)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在番禺和烏坎事件的個案比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表四所示，大陸媒體對番禺事件的報道(n = 228)遠遠多於海外媒體(n = 24)，但大陸媒體的原創率(25.9%)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遠低於海外媒體(45.8%)，兩者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 $X^2(1, N = 252) = 4.28, p < .05$ )。海外媒體對烏坎事件的報道( $n = 485$ )顯著多於大陸媒體( $n = 304$ )，且原創率(89.9%)也大大高於大陸媒體(18.1%)，兩者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 $X^2(1, N = 789) = 409.89, p < .001$ )。

表四 番禺事件與烏坎事件媒介報道之比較

	番禺事件			烏坎事件				
	原創	轉載		原創	轉載			
海內外 媒體原 創率之 比較	大陸媒體 ( $n = 228$ )	25.9%	74.1%	大陸媒體 ( $n = 304$ )	18.1%	81.9%		
	海外媒體 ( $n = 24$ )	45.8%	54.2%	海外媒體 ( $n = 485$ )	89.9%	10.1%		
海內外 媒體不 同階段 報道量 之比較	早期	中期	後期	早期	中期	後期		
	大陸媒體 ( $n = 228$ )	6.6%	43.9%	49.6%	大陸媒體 ( $n = 304$ )	/	12.5%	87.5%
海內外 媒體報 道框架 之比較	對話	對抗	其他	對話	對抗	其他		
	大陸媒體 ( $n = 59$ )	74.6%	15.3%	10.1%	大陸媒體 ( $n = 55$ )	52.7%	10.9%	36.4%
	海外媒體 ( $n = 11$ )	9.1%	63.6%	27.2%	海外媒體 ( $n = 436$ )	31.4%	45.6%	22.9%

從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看，無論是大陸媒體還是海外媒體在兩起事件發展的早期，都沒有進行充分的報道。大陸媒體從中期開始對番禺事件進行持續跟進(43.9%)，到後期達到高潮(49.6%)，海外媒體也是後期才「火力全開」(75%)。而烏坎事件，大陸媒體(12.5%)和海外媒體(15.9%)在中期的報道量開始增加，但一直等到抗爭最膠著最戲劇性的後期才全面跟進(大陸媒體87.5%，海外媒體84.1%)。

再來看報道框架，儘管兩起事件訴求迥異、抗爭的衝突程度也大不相同(番禺溫和、烏坎激烈)，大陸媒體採用「對話」的比率遠高於海外媒體(番禺事件大陸媒體74.6%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體僅9.1%採用「對話」框架；烏坎事件大陸媒體52.7%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體僅31.4%採用「對話」框架)，海外媒體採用對抗框架的比率遠高於大陸媒體(番禺事件海外媒體63.6%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媒體僅15.3%採用「對抗」框架；烏坎事件海外媒體45.6%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媒

體僅 10.9% 採用「對抗」框架)。大陸和海外媒體在報道框架上存在顯著差異(番禺事件： $X^2(2, N = 70) = 17.79, p < .001$ ；烏坎事件： $X^2(2, N = 581) = 24.27, p < .001$ )。毫無疑問，海內外媒體從各自角度出發對番禺和烏坎事件進行了選擇性報道。

### 番禺與烏坎行動者的媒介策略之比較

現階段中國社會抗爭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媒介關注，但我們的數據又證明，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媒體，選擇性報道在所難免。然而行動者並非完全被動，在互聯網等 ICT 技術提供的另類媒體平台上，他們可以與傳統媒體展開良性博弈。在事件發展的早期、中期和後期，番禺業主和烏坎村民採取了非常靈活的策略，調動各種媒介以完成相應的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任務。

#### I. 早期社交媒體主導的「連結性領導力」

番禺垃圾焚燒廠選址樓盤林立、人口稠密的會江村，僅周邊麗江花園、碧桂園、雅居樂、南國奧園、錦綉香江、華南新城、海龍灣、星河灣等大型樓盤的居民就超過 30 萬。要對如此龐大數量的人口進行有效動員，並非易事。在抗爭早期，行動者致力於將原有的業主論壇、QQ 群等「融合性社區媒介」升級為信息分享、在線討論與行動策劃的網絡大本營。社交媒體發揮了兩方面的「連接性」功能：一，在麗江花園的業主論壇「江外江」<sup>4</sup> 設立「垃圾焚燒專版」，將周邊眾多受影響小區分散的討論集中在一起，形成最廣泛意義上的共識；二，建立「群上群」，將眾多小區已有的 QQ 群串聯起來，與線下的「小區間聯合會議」互為補充，提高利益共同體的決策效率。同時，社交媒體上自發湧現了一批意見領袖(巴索風雲、櫻桃白、阿加西等)，他們高質量的討論為集體共識定下基調，他們在線上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然而，在接受我們訪談時，他們卻一再強調「我們都是無組織的人」<sup>5</sup>(巴索風雲訪談)、「我沒有領袖能力」(櫻桃白訪談)、「不是無組織而是不得有組織。站在前面的人風險很大，一旦有什麼控制不了的事情，站在前面的人就會成為責任人」(阿加西訪談)。在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態下，社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媒體為集體行動的實際領導人提供了掩護(這種掩護至少在網絡監管部門還沒有介入的抗爭早期是非常有效的)，使他們以「熱心網友」這一相對安全的身份，影響著成百上千素未謀面的追隨者。

短短一個月番禺業主就完成了早期動員，並通過社交媒體策劃了多次「連接性行動」，這必須歸功於之前累積的媒介資源：各小區都有成熟的業主論壇和業主群、城市中產階級業主新媒體技能/素養相對較高。相比之下，烏坎村民原有的媒介資源幾乎為零，不得不經過長達兩年多的經營，才得以在村委會的嚴密監控之外建立一個以QQ群為核心的「數碼先鋒隊」，從線上滲透至線下，完成早期動員，具體過程如下：2009年2月，在外地打工的年青人「愛國者1號」建立了「烏坎熱血青年團」(後改名「烏坎愛國青年團」)QQ群，號召大家把群號「發送給你身邊的烏坎人！讓更多人加入進來，烏坎村才有希望取得勝利！」該群在兩年內擴張成一個主群兩個副群，上千成員分散在珠三角甚至全國各地，其中還包括不少烏坎在校中小學生。如果說番禺事件中社交媒體的「連接性」主要表現為對已有資源的「串聯」與「聚合」，那麼烏坎事件中的QQ群的「連接性」則是從零開始的資源「開發」與「建設」。在那之前，烏坎村民既沒有渠道、也沒有熱情關注土地問題，是QQ群提供了土地轉讓內部協議、政府批文、佔用耕地清單等必要信息，從無到有建立了烏坎村民關於土地問題的共識。正如一位很早入群的村民所言：「其實，光看網名，誰都不知道背後是誰。一個一萬多人的村子，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也不多……就是靠QQ群把人心籠絡起來的，很多消息都是依靠群來發布。那時候政府還沒有監控，大家都是暢所欲言。」有趣的是，烏坎事件早期QQ群創辦者和使用者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青人，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實現了「領導力」的自覺。理論上來說，這批年青人或在外地打工、或仍在學校讀書，對土地問題的關切度比不上在村裏成家立業的父母輩。但「人生易受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 (McAdam, 1986)——即，在人生的某個階段，來自工作、婚姻和家庭責任的牽掛與限制相對較少，參與社會運動的風險與成本也相對較少——使他們比父母輩更敢於挑戰權力壓迫，同時他們也掌握了父母輩所不具備的新媒體技能/素養，得以在互聯網這一傳統權

力結構之外的虛擬空間展開行動。兩個常年在QQ群置頂的文件——《國際人權公約》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更顯示出這批年輕領導者試圖將抗爭「品牌化」的努力，即，將本村的土地問題塑造為一個既關於人權又關乎國際反腐的「大事」。遺憾的是，這批年青人的「領導力」未能從線上走到線下，他們通過QQ群策劃的幾次集體上訪都因為村委會的封鎖未能成行。

## II. 中期新舊媒體之間的「媒介互激與循環」

隨著鬥爭不斷深入，番禺業主和烏坎村民都需要不斷鼓舞士氣、動員人們參與集體行動。番禺業主充分調動其人脈資源（事實上，有業主本身就是媒體人士），將幾乎所有的廣州媒體都吸引過來，平均每天有3篇相關報道。在官方信息不透明業主士氣低落的情況下，番禺業主通過豐富多彩的「話語實驗」與「行為藝術」，不斷將新議題（比如李坑垃圾焚燒廠的污染問題、垃圾焚燒背後的利益鏈等）和新劇目（比如網友櫻桃白帶防毒面罩坐地鐵進廣州）通過互聯網輸送給大眾媒體人士，通過後者的新聞報道「倒逼」官方予以回應。以「江外江論壇」為代表的新媒體平台與熟諳官方口徑的傳統媒體之間的互激效應，設置了番禺區乃至廣州市政府和民眾的議程，誘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集體行動。

相比之下，烏坎村民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合作可謂波折不斷。雖然多次集體上訪以及劇烈的官民衝突吸引了一些大陸媒體前來採訪，但報道要不未能刊出、要不歪曲事實，以至於村民懸掛橫幅批評媒體「報道不客觀、造假新聞」。為了突破信息封鎖，村民不得不轉向替代性媒介：海外媒體和互聯網。利用地緣（毗鄰港澳）和鄉緣（海外有5,000多烏坎僑胞）優勢，烏坎村民盡可能地聯繫海外媒體前來採訪，並在村民領袖林祖鑾家附近租借一幢民宅設立新聞中心，提供食宿和網絡。在烏坎抗爭中期，海外媒體發布了77篇報道，且絕大多數是原創，遠超大陸媒體（38篇，大部分是通稿）。突破封鎖線的另一個陣地就是互聯網。從外地返鄉參加抗爭的年輕人在網吧裏打起了「新聞仗」（吳吉金訪談），帳號被「和諧」後再次申請，網絡斷掉之後再安裝，核心的成員張建興先後註冊了「5個QQ帳號、7個微博帳號、4個Gmail帳號、4個Skype帳號、2個Twitter帳號、N個手機號，加上Facebook、Blogger、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VPN」，不斷直播烏坎鬥爭實況。番禺業主的新媒體實踐僅限於「use」(使用)，烏坎村民卻跨越到「do」(製作)階段。他們自籌捐款8,300元從深圳華強北買來了攝像機，做起了公民記者，自己採訪、拍攝、編輯完成了兩部時長約一小時的獨立紀錄片《烏坎！烏坎！》，並借助免費的編輯軟件(繪聲繪影)改編Michael Jackson《地球之歌》，重新填詞演唱《烏坎之歌》MV。這些自製媒體內容被傳上網、免費提供給媒體記者，並在村內循環播放鼓舞士氣。

### III. 後期傳統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爭」

番禺和烏坎抗爭在後期都進入高潮，但也都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即，與官方展開利益博弈。因此，行動者必須在傳統媒體這個重要的官民對話平台上伸張抗爭的合法性，贏取社會民眾更廣泛的支持與同情。番禺業主將事件的成功歸功於「傳統媒體近乎瘋狂的炒作」(櫻桃白訪談)：大陸媒體平均每天有14篇報道，參與的媒體不僅限於廣東省內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中新社、《中國青年報》等紛紛撰寫評論，聲援番禺業主。一時間，番禺事件成為舉國矚目的「媒介奇觀」，而番禺業主也被塑造為合理合法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的「公民樣本」。傳統媒體主導的媒介化抗爭之所以在番禺得以實現，則要歸功於番禺業主靈活有彈性的媒介策略。正如網友mice99所言：「你封殺廣州的媒體，你能封殺全國？全世界的媒體嗎？你能封殺網絡嗎？不斷的製造新聞，這樣才能喚起更多民眾的注意。」

在抗爭後期，烏坎村民代表薛錦波的突然死亡引發一波又一波抗議浪潮，蜂擁而至的海外媒體記者將烏坎塑造為一個神奇的「孤島」，不遺餘力地予以報道(海外媒體平均每天有19篇報道，且大多都是原創)。然而這種以海外媒體為主導的媒介化抗爭給烏坎村民帶來鼓舞的同時，也帶來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負面影響。正如我們在多案例綜合分析中已經指出來的，海外媒體往往傾向於誇大衝突，在烏坎事件中尤為如此，有些甚至使用了「起義」和「造反」等敏感詞匯，使得地方官員借機批評村民通過「三爛」(即，「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來「勾結海外勢力」。面對如此嚴重的指控，烏坎村民的處理方式顯示出中國農民獨特的狡黠與智慧。他們借助自己的博客微博，不斷重申

村民是「依法抗爭」：「我們不是起義，我們不是反共，我們不是分裂國家，我們是單純的土地問題」（張建興微博）、「我們就是簡單的土地問題訴求，請市府和各界媒體不要再誇張我們的性質」（吳吉金微博）。同時，他們在村中及網上貼出中英文版〈告媒體朋友書（To the media friends）〉：「烏坎村很高興可以見到這麼多的媒體人員，對於我村事件，還請正面報道，避開『起義』、『起事』等字眼，我們不是起義，我們擁護共產黨，我們愛國家。」據張建興回憶，英文版是他通過金山詞霸翻譯獲得。在策略性地撇清與海外媒體關係的同時，他們又抓住了「精英分裂」的政治機會，在省工作組進村開展工作前期，通過傳統媒體表達姿態性地妥協與效忠。在抗爭後期，大陸媒體對烏坎事件的報道量同樣很高（平均每天13篇），且大多採用溫和而富有建設性的對話框架，為官民談判與利益博弈營造了和諧的氛圍。烏坎事件順利解決後，林祖鑾表示這既歸功於「村民為了集體的利益高度的團結、高度的協調、高度的組織性和遵守法律的自覺性」，也歸功於「媒體公開、公正的報道，使全國以及境外引起的高度關注」。<sup>6</sup> 這個面面俱到的總結，恰恰證明了烏坎村民在海外媒體與大陸媒體之間「走鋼絲」式的周旋是何其不易。

## 結論與討論

儘管近年來傳播學界對社會抗爭的研究蔚然成風，但與其他學科相比，本學科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究其原因有三：一，研究視角單一，大多聚焦於媒介如何報道社會抗爭，較少關注行動者如何使用媒介來進行社會抗爭；二，研究方法單薄，大多是個案研究，很少多案例綜合比較分析；三，最重要的是，理論模式匱乏，從其他學科借鑒大量理論，卻未能圍繞著本學科的核心命題提出有解釋力的概念。有鑒於此，本文試圖通過多案例綜合比較環保與徵地抗爭中行動者的媒介實踐，來凸顯媒介資源（媒介工具、媒介技能/素養、媒介人脈等）在中國社會抗爭中的關鍵作用，從而在理論上將媒介策略——行動者根據抗爭不同階段需要對媒介資源進行動員整合的全過程——確立為與行動策略和話語策略同等重要的社會抗爭策略。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們進一步提出了媒介化抗爭、連接性領導力和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分析框架來分別指代傳統媒體主導、新媒體主導、新舊媒體媒體共生的媒介策略。

在中國討論社會抗爭，一定離不開社會變遷。討論社會變遷，一定離不開媒介生態變遷。近年來，國家對媒介實行全方位監控，在群體性事件這種敏感話題的報道上，新聞媒體雙軌制所帶來的黨報黨刊與市場化媒體之間的差異幾乎被抹平。因此，「牆」內外媒體報道差異成為行動者必須善加利用的媒介資源。我們對2009–2014年期間發生的40起案例的綜合分析以及對番禺和烏坎兩個代表性事件的個案比較顯示，環保抗爭因為安全範式的存在而得到大陸媒體更多的報道，而海外媒體則更熱衷於報道衝突強烈的徵地抗爭。安全範式不僅體現在大陸媒體報道的選題上，還影響到報道的獨立性和框架。與海外媒體相比，大陸媒體轉發官方通告或央媒通稿的比率高的驚人，「千報一面」成為群體性事件報道的常態。而大陸媒體為數不多的原創報道也多採用「對話」框架，把社會抗爭包裝成各方理性博弈的「願景」，化矛盾為和諧。與之相反，海外媒體的原創報道則多採用「對抗」框架，「隔岸觀火」，把中國的社會抗爭(尤其是徵地衝突)「炒作」成社會矛盾難以調和的「起義」甚至「革命」。

「牆」內外媒體報道的兩極化，對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大陸媒體與海外媒體之間的報道差異為行動者提供了媒介博弈空間：他們或者可以將訴求包裹在安全範式內以爭取大陸媒體的關注；或者可以聯繫海外媒體，通過「新聞的出口轉內銷」來「曲線救國」。但這種博弈極具風險：大陸媒體有可能選擇性忽視行動者的真實訴求，而海外媒體則有可能選擇性誇大他們的真實訴求。為了突破這種兩難之境，必須拓展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型媒介資源。我們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媒介技能/素養成熟、媒介人脈強大的番禺業主，還是媒介技能/素養有限、媒介人脈匱乏的烏坎村民都致力於使用新媒體工具來優化媒介策略。儘管媒介化抗爭、連接性領導力和媒介互激與循環這三大媒介策略分別主導了不同階段的社會抗爭，但新媒體卻是貫穿始終的核心元素，具體表現為：在抗爭早期，行動者通過新媒體的「連結性領導力」實現內部成員的共意凝聚；在抗爭中期，行動



者通過新媒體平台上的造勢「刺激」傳統媒體的報道，並通過新舊媒體的循環傳播「倒逼」官方，鼓舞士氣；在抗爭後期，行動者通過新媒體發出獨立的聲音，影響傳統媒體的報道框架、澄清傳統媒體的「過度解讀」，贏取社會同情與官方信任。

在眾多發現中，尤為令我們興奮的是，烏坎村民在抗爭中展現出來的「新媒體後發優勢」。毋庸置疑，以失地農民為主的烏坎村民最初的新媒體技能 / 素養原本遠落後於番禺業主，但他們卻迸發出驚人的創造力與行動力，比番禺業主更多、更好、更廣泛、更深入地利用 ICT 為抗爭服務。通過自我學習和分組合作，烏坎村民不僅使用新媒體 (use) 來傳播信息，而且製作新媒體 (do)，利用廉價設備和免費軟件生產出極具生命力 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音樂和視頻，可以視作「新媒體賦權」的最佳證明。陳鵬、臧雷振 (2015) 基於全國農村樣本數據的實證分析顯示，由於城鄉數字鴻溝的存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對於農民日常政治參與行為影響有限。然而，我們的研究卻顯示，在突發性群體性事件中，強大的動機、有效的分工合作以及山寨學習能力有可能促使城鄉數字鴻溝被迅速填平甚至反超。

儘管新媒體已然滲透到中國社會抗爭媒介策略的各個環節，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媒體並非萬能。與集體行動相關的信息向來是中國互聯網輿論審查的重中之重 (King, Pan, & Roberts, 2013)。而習近平在 2016 年 2 月 19 日召開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顯示，執政黨正在跨越新舊媒體之間的斷層，將對傳統媒體行之有效的管理全面推向互聯網言論空間 (王夢瑤、胡泳, 2016)。隨著互聯網自由度的收緊，新媒體的組織動員功能勢必不斷式微。2016 年夏天，平靜多時的烏坎又起波瀾，但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互聯網上，都很難找到除官方通告以外的信息，這與 2011 年烏坎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暴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媒介生態的變遷由此可見一斑。在這種情境下，各種媒體技術平台的「抱團取暖」顯得尤為重要，明智的社會抗爭行動者更應該重視媒體之間的合縱連橫，通過靈活務實的媒介策略來實現有效的共識動員、行動動員和社會動員。

媒體審查不僅會影響到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事實上，也已經影響到了本研究的數據採集。因個別年份新聞報道缺失所導致的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據斷層，使我們未能呈現一幅全面、精確的社會抗爭媒介化圖景。此外，由於採集到的新聞報道數量較大(4,167篇)，我們所做的內容分析不夠細緻，未能透過字裏行間的細微之處把握媒體人的堅守。比如，即便都是轉發官方通告或中央媒體通稿，仍然有些媒體通過自主編輯手段(修改標題或導語、刪減內容、整合組稿)來傳遞一些弦外之音。在新聞專業主義「大道不行」的背景下，未來的研究或許更應著眼於媒體人的「本土化專業主義」話語實踐(Pan & Lu, 2003)來正確理解媒介對社會抗爭的重構。本文的另一局限在於番禺和烏坎個案比較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見。廣東省獨特的媒介生態與地緣優勢，是否遠比行動者主觀的媒介策略更能影響到社會抗爭的走向？這個問題，有待更多元的比較研究來予以回答。

## 註釋

### 1 2009–2014年期間中國徵地與環保群體事件：

徵地群體性事件		環保群體性事件	
時間	發生地	時間	發生地，原因
2009年3月	重慶長壽	2009年7月	湖南武岡，鉛中毒
2010年1月	江蘇邳州	2009年8月	陝西鳳翔，鉛中毒
2010年1月	河南楊莊	2009年8月	福建泉州，污水
2010年1月	廣東佛山萬石村	2009年8月	湖南瀏陽，鎘中毒
2010年11月	安徽池州梅龍鎮	2009年9月	福建上杭，鉛中毒
2011年4月	雲南綏江水庫	2009年10月	廣東番禺，垃圾焚燒
2011年6月	湖北利川	2011年3月	江蘇南京，保護梧桐樹
2011年6月	浙江台州	2011年5月	內蒙古，煤礦污染
2011年9月	廣東烏坎	2011年8月	遼寧大連，PX
2013年7月	四川成都青龍鄉	2011年9月	浙江海寧，太陽能電廠
2013年4月	貴州印江	2011年12月	廣東汕頭，華能集團
2013年9月	廣西桂平市南木鎮	2012年7月	四川什邡，鉛銅項目
2014年9月	廣東汕頭蓮塘村	2012年7月	江蘇啟東，王子紙業排污
2014年10月	雲南晉寧縣晉城鎮	2012年10月	浙江寧波，PX
2014年11月	河北邯鄲臨漳縣	2013年5月	雲南昆明，PX

徵地群體性事件		環保群體性事件	
時間	發生地	時間	發生地，原因
2014年11月	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	2013年5月	四川成都，PX
2014年11月	廣東揭陽普寧市	2013年7月	廣東江門，核電站
2014年12月	廣西桂平西山鎮	2014年2月	雲南貝哈，冶煉廠污染
總計：徵地事件18起，環保事件22起		2014年3月	廣東茂名，PX
		2014年5月	浙江杭州，垃圾焚燒
		2014年9月	廣東博羅，垃圾焚燒
		2014年9月	河南獲嘉，化工廠污染

- 2 對於這兩起事件，我們已經分別完成了個案研究，具體的數據採集方法請參見論文(周裕瓊、齊發鵬，2014；周裕瓊、蔣小艷，2014)。
- 3 番禺事件被《人民日報》、《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等多家媒體評為2009年度事件；烏坎事件也被《人民日報》、《聯合早報》、《香港文匯報》、《新世紀周刊》等多家海內外媒體評為2011年度事件。
- 4 成立於2002年的江外江論壇所屬社區是距規劃中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約2公里的番禺麗江花園，該論壇是廣州人氣最旺的社區論壇之一。在2009年底垃圾焚燒事發期間，註冊會員增至5.5萬多(該小區的常住人口為5萬左右)，不少會員來自周邊的其他小區。
- 5 除特別註明外，本文楷體字的引用均來自訪談資料。
- 6 引自艾曉明拍攝的紀錄片《烏坎三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陳鵬、臧雷振 (2015)。〈媒介與中國農民政治參與行為的關係研究——基於全國代表性數據的實證分析〉。《公共管理學報》，第12卷第3期，頁69–82。
- Chen Peng, Zang Leizhen (2015). Meijie yu zhongguo nongmin zhengzhi canyu xingwei de guanxi yanjiu — Jiyu quanguo daibiaoxing shuju de shizheng fenxi. *Gonggong guanli xuebao*, 12(3), 69–82.
- 陳天祥、金娟、胡三明 (2013)。〈「媒介化抗爭」：一種非制度性維權的解釋框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71期，頁90–9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Chen Tianxiang, Jin Juan, Hu Sanming (2013). “Meijiehua kangzheng”: Yizhong feizhiduxing weiquan de jieshi kuangjia. *Jiang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71, 90–96.
- 董海軍(2008)。〈「作為武器的弱者身份」：農民維權抗爭的底層政治〉。《社會》，第28卷第4期，頁34–58。
- Dong Haijun (2008). “Zuowei wuqi de ruozhe shenfen”: Nongmin weiquan kangzheng de diceng zhengzhi. *Shehui*, 28(4), 34–58.
- 黃煜、曾繁旭(2011)。〈從以鄰為壑到政策倡導：中國媒體與社會抗爭的互激模式〉。《新聞學研究》，第109期，頁167–200。
- Huang Yu, Zeng Fanxu (2011). Cong yilinweihe dao zhengce changdao: Zhongguo meiti yu shehui kangzheng de huji moshi. *Xinwenxue yanjiu*, 109, 167–200.
- 黃振輝(2011)。〈表演式抗爭：景觀、挑戰與發生機制——基於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開放時代》，第224期，頁71–84。
- Huang Zhenhui (2011). Biaoyanshi kangzheng: Jingguan, tiaozhan yu fasheng jizhi—Jiyu zhujiang sanjiaozhou dianxing anli yanjiu. *Kaifang shidai*, 224, 71–84.
- 李立峯(2009)。〈範式訂定事件與事件常規化：分析香港主流報章對Youtube短片的報道〉。《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181–202。
- Li Lifeng (2009). Fanshi dingding shijian yu shijian changguihua: Fenxi xianggang zhuliu baozhang dui Youtube duanpian de baodao.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181–202.
- 劉能(2009)。〈當代中國轉型社會中的集體行動：對過去三十年間三次集體行動浪潮的一個回顧〉。《學海》，第4期，頁146–152。
- Liu Neng (2009). Dangdai zhongguo zhuanxing shehuizhong de jiti xingdong: Dui guoqu sanshinianjian sanci jiti xingdong langchao de yige huigu. *Xuehai*, 4, 146–152.
- 黎相宜(2009)。〈精英型與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較失地農民與知識精英的集體抗爭〉。《社會》，第29卷第6期，頁107–126。
- Li Xiangyi (2009). Jingyingxing yu caogenxing kuangjia jieyong: bijiao shidi nongmin yu zhishi jingying de jiti kangzheng. *Shehui*, 29(6), 107–126.
- 羅興佐(2013)。〈有動員無組織：熟人社會中的集體行動——對一起農村群體事件的分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71期，頁66–72。
- Luo Xingzuo (2013). You dongyuan wu zuzhi: Shuren shehuizhong de jiti xingdong—Dui yiqi nongcun qunti shijian de fenxi. *Jiang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71, 66–72.

- 呂德文 (2012)。〈媒介動員、釘子戶與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社會》，第32卷第3期，頁129–170。
- Lv Dewen (2012). Meijie dongyuan, dingzihu yu kangzheng zhengzhi: Yihuang shijian zai fenxi. *Shehui*, 32(3), 129–170.
- 蒂利、塔羅 (2010)。《抗爭政治》(李義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Tilly, C., & Tarrow, S.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 Di Li, Ta Luo (2010). *Kangzheng zhengzhi*, Li Yizhong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illy, C., & Tarrow, S.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 孫瑋 (2007)。〈「我們是誰」：大眾媒介對於新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感建構——廈門PX項目事件大眾媒介報道的個案研究〉。《新聞大學》，第93期，頁140–148。
- Sun Wie (2007). “Women shi shui”: Dazhong meijie duiyu xinshehui yundong de jiti rentonggan jiangou—Xiamen PX xiangmu shijian dazhong meijie baodao de ge’an yanjiu. *Xinwen daxue*, 93, 140–148.
- 童志鋒 (2009)。〈歷程與特點：快速轉型期下的中國環保運動〉。《理論月刊》，第307期，頁144–147。
- Tong Zhifeng (2009). Licheng yu tedian: Kuaisu zhuanxingqi xia de zhongguo huanbao yundong. *Lilun yuekan*, 307, 144–147.
- 王斌、古俊生 (2014)。〈參與、賦權與連結性行動：社區媒介的中國語境和理論意涵〉。《國際新聞界》，第36卷第3期，頁92–108。
- Wang Bin, Gu Junsheng (2014). Canyu, fuquan yu lianjiexing xingdong: Shequ meijie de zhongguo yujing he lilun yihan. *Guoji xinwenjie*, 36(3), 92–108.
- 王洪偉 (2010)。〈當代中國底層社會「以身抗爭」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個「艾滋村民」抗爭維權的啟示〉。《社會》，第30卷第2期，頁215–234。
- Wang Hongwei (2010). Dangdai zhongguo diceng shehui “yishen kangzheng” de xiaodu he xiandu fenxi: Yige “aizi cunmin” kangzheng weiquan de qishi. *Shehui*, 30(2), 215–234.
- 王夢瑤、胡泳 (2016)。〈中國互聯網治理的歷史演變〉。《現代傳播》，第237期，頁127–133。
- Wang Mengyao, Hu Yong (2016). Zhongguo hulianwang zhili de lishi yanbian. *Xiandai chuanbo*, 237, 127–133.
- 夏瑛 (2014)。〈從邊緣到主流：集體行動框架與文化情境〉。《社會》，第34卷第1期，頁52–7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Xia Ying (2014). Cong bianyuan dao zhuliu: Jiti xingdong kuangjia yu wenhua qingjing. *Shehui*, 34(1), 52–74.
- 徐昕(2008)。〈為權利而自殺：轉型期中國農民工的「以死抗爭」〉。《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6集，頁255–305。
- Xu Xin (2008). Wei quanli er zisha: Zhuanxingqi zhongguo nongmingong de “yisi kangzheng.” *Zhongguo zhidu bianqian de anli yanjiu*, 6, 255–305.
- 于建嶸(2004)。〈當前農民維權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第19卷第2期，頁49–55。
- Yu Jianrong (2004). Dangqian nongmin weiquan huodong de yige jieshi kuangjia. *Shehuixue yanjiu*, 19 (2), 49–55.
- 于建嶸(2010)。《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
- Yu Jianrong (2010). *Kangzhengxing zhengzhi: Zhongguo zhengzhi shehuixue jiben went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趙鼎新(2006)。《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ao Dingxin (2006). *Shehui yu zhengzhi yundong jiangy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2014)。〈媒介運用與環境抗爭的政治機會：以反核事件為例〉。《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4期，頁116–126。
- Zeng Fanxu, Dai Jia, Wang Yuqi (2014). Meijie yunyong yu huanjing kangzheng de zhengzhi jihui: Yi fanhe shijian weili. *Zhongguo dizh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4(4), 116–126.
- 鄭雯(2015)。《媒介化抗爭：變遷、機理與挑戰》。北京：華夏出版社。
- Zheng Wen (2015). *Meijiehua kangzheng: Bianqian, jili yu tiaozhan*.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 鄭雯、黃榮貴、桂勇(2015)。〈中國抗爭行動的「文化框架」——基於拆遷抗爭案例的類型學分析(2003–2012)〉。《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2卷第2期，頁5–26。
- Zheng Wen, Huang Ronggui, Gui Yong (2015). Zhongguo kangzheng xingdong de “wenhua kuangjia” — Jiyu chaiqian kangzheng anli de leixingxue fenxi (2003–2012).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2(2), 5–26.
- 鄭雯、黃榮貴(2016)。〈「媒介邏輯」如何影響中國的抗爭——基於40個拆遷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國際新聞界》，第38卷第4期，頁47–66。

- Zheng Wen, Huang Ronggui (2016). “Meijie luoji” ruhe yingxiang zhongguo de kangzheng—Jiyu 40ge chaiqian anli de mohuji dingxing bijiao fenxi. *Guoji xinwenjie*, 38(4), 47–66.
- 張志安 (2013)。〈新聞生產過程中的自我審查研究——以「毒奶粉」事件的報道為個案〉。《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0卷第5期，頁24–43。
- Zhang Zhi'an (2013). Xinwen shengchan guochengzhong de ziwo shencha yanjiu—Yi “dunaifen” shijian de baodao wei ge'an.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0(5), 24–43.
- 中國社科院 (2005)。《社會藍皮書：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ongguo shekeyuan (2005). *Shehui lanpishu: 2005nian zhongguo shehui xingshi fenxi yu yuc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中國社科院 (2013)。《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Zhongguo shekeyuan (2013). *Shehui lanpishu: 2013nian zhongguo shehui xingshi fenxi yu yuc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周裕瓊、蔣小艷 (2014)。〈環境抗爭的話語建構、選擇與傳承〉。《深圳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3期，頁131–140。
- Zhou Yuqiong, Jiang Xiaoyan (2014). Huanjing kangzheng de huayu jiangou, xuanze yu chuancheng. *Shenzhe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31(3), 131–140.
- 周裕瓊、齊發鵬 (2014)。〈策略性框架與框架化機制：烏坎事件中抗爭性話語的建構與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第21卷第8期，頁46–69。
- Zhou Yuqiong, Qi Fapeng (2014). Celvexing kuangjia yu kuangjiahua jizhi: Wukan shijianzhong kangzhengxing huayu de jiangou yu chuanb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21(8), 46–69.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4). Three patterns of power in technology-enabled conten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4), 421–439.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232–26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0期(2017)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n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Cai, Y.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Press.
- Chadwick, A. (2013).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 (2015) *The cement of civil society: Civic networks in local setting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R. D., & Valeriani, A. (2014). Remixing the Spring! Connective leadership and read-write practices in the 2011 Arab Uprisings. In C. Padovani & A. Calabrese (Eds.), *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pp. 288–30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reeman, J. (1979).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trategy. In M. N. Zald & J.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pp.167–189). Cambridge, MA: Winthrop.
- Garrett, K.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2), 202–224.
- Gerbaudo, P. (2012).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London: Pluto Press.
- Gerbaudo, P. (2016). Social media teams as digital vanguards: The question of leadership in the management of key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dignados and UK Uncu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Retrieved July 20, 2016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369118X.2016.1161817>.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ward, P. N., & Hussain, M. M. (2013). *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R., & Sun, X. (2014). Weibo network,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1), 86–104.
- Jenkins, J. C.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53.
- Kellner, D. (2003).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1–18.
- Lagerkvist, J. (2015). The unknown terrain of social protests in China: “Exit,” “voice,” “loyalty,” and “shadow.”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11(2), 137–153.



- MacKinnon, R. (2011). 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2(2), 32–46.
- McAdam, D.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1), 64–90.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Michailidou, A. (2010). Vertical Europeanisation of online public dialogue: EU public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online implementation. In B. Cristiano & B. Emanuela (Eds.), *Mapping the European public sphere* (pp. 65–82). Surrey, United Kingdom: Ashgate.
- O'Brien, K. 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 Z., & Lu, Y.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 In C. 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215–236). London: Routledge.
- Poell, T. (2014). *Social media activism and state censorship*. Retrieved July 12, 2016,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04544](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04544).
- Poell, T., Abdulla, R., Rieder, B., Woltering, R., & Zack, L. (2016). Protest leadership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7), 994–1014.
- Scheufele, D. A.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1), 103–122.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Tufekci, Z., & Wilson, C. (2012).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2), 363–379.
- Yang, Y. (2016). How large-scale protests succeed in China: The story of issue opportunity structure, social media, and vio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2895–2914.

## 本文引用格式

周裕瓊、楊雲康(2017)。<〈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基於環保與徵地事件的綜合比較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169–201。

